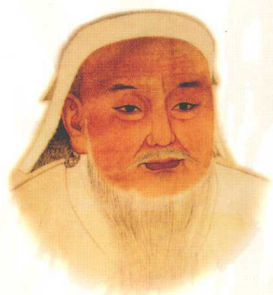


〔法〕勒尼·格鲁塞 著
魏英邦 译



草原帝国

亚欧草原三千年游牧民族史的恢弘画

马背民族英雄祖先的壮丽史诗

东方学经典史著

作者弟子法文原译





草原帝國

——



RENÈ GROU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ATTILA, GENGIS-KHAN, TAMERLAN

PAYOT, PALIS

1939

草原帝国

[法] 勒尼·格鲁塞 著

魏英邦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帝国/(法)格鲁塞(Grousset, R.)著;魏英邦译. —2版.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5-04178-0

I. ①草… II. ①格… ②魏… III. ①游牧民族—民族历史—亚洲—古代IV. ①K3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1283号

草原帝国

[法]勒尼·格鲁塞 著

魏英邦 译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开 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520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2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225-04178-0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序

我们先介绍原著者的简历，然后谈本书内容，以及与本书第二章有关的东西方史料和专门研究。

勒尼·格鲁塞（1885～1952年）教授为现代法国研究亚洲史的学界泰斗，生平著述甚富。就译者所知，他于1921～1922年时即出版了一部巨著《亚洲史》；于1929年发表《远东史》，获得法国铭文学院的茹理安奖金。该书中的蒙古帝国史部分已由冯承钧氏译成汉文（《蒙古史略》1933年）；同年，又发表《在佛陀的遗迹上》一书，受到法兰西学院的褒奖；1929～1930年，他出版《东方文明史》，包括近东、印度、中国、中亚细亚与日本。次年，该书即被菲利普斯译成英文；1931年，他的《印度诸派哲学》问世；1936年，他出版《十字军战争史》获得法兰西学院与法国铭文学院的两种奖金；《草原帝国》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于1939年出版，在作者去世后已再版了两次。1946年，该书被日本蒙古史学者俊藤十三雄译成日文《亚细亚游牧民族史》；1941年，他的《蒙古帝国史》出版，书内叙述历史是自成吉思汗的先世至忽必烈于1294年死时为止。这是一部归纳了东西方史料的杰作，读者们对它期待已经很久了；1951年，在作者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完成了《中国和它的艺术》一书，书内充满对我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赞扬和推崇。

此外，格鲁塞教授写过几种通俗化的小册子如《亚洲与历史》，和一些短篇论文与书评。除从事于东方历史著作外，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亦不遗余力。在法国出版的几种艺术史丛书内常有其论文或序言。在他的晚年，他主持出版了彩色影印的东方古画选集数册。

他是法国巴黎东方文物馆的馆长，鲁佛皇宫学校与东方语言学校的历史教授，亚洲学会的秘书长。在1946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此外，他还兼任法国地理学会、作家协会，以及英、比、荷、瑞士等国的学术团体的名誉会长、顾问、理事等职。

我们介绍这部法国资产阶级东方史学家格鲁塞的作品，目的在于明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高原古代游牧民族历史研究的成果与动向。至于作者的史学观点及其对原始史料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则并非我们所

同意的。作者完成这部著作前曾耗费了多年的心血，参考了不少的史料和专门研究。他综合地利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在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与东方学方面的最新的成就。因此，使人感到他这部著作在题材上很新颖，在内容上很丰富，是一部西方近几十年来在突厥—蒙古民族史学方面研究的总结。

顾名思义，《草原帝国》是一部古代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通史。全书以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与王朝为纲，将它们的兴亡以纪事本末体的方法系统地介绍给读者。史实是繁多的，因为这部通史所涉及的空间甚广，从日本海到法国中部，时间甚长，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到公元后 18 世纪中叶。作者还在《草原帝国》的大标题下提出三个英雄人物：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成吉思汗是我们熟知的，但阿提拉是个古代汉文史上不曾有过的名字；至于帖木儿他曾与明朝于公元 1387~1405 年间有过外交使节上的来往，但《明史》对他在西方建立的帝国和他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则一无所知。

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只不过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以外建立了大帝国的代表，其只在草原上东奔西驰，南征北战，思图摹仿他们的行为的人物何止数十百人。格鲁塞对这三个大帝国的创立者作了详细的传记，但对其他在草原上建立王国的好汉们也并不忽略地一一叙述了他们的来历，分析了他们之所以失败和成功的原因。作者反对个人崇拜，他认为这些创建伟大帝国的人物，或者只称霸于一方的酋长们，都不过是时代和环境的产儿。作者甚至是个机械唯物论者，他说游牧民族的迁徙、远征、侵略邻国，都是受制于“自然法则”的结果。

全书共分三章，在比例上很不均匀。第一章阐述第 13 世纪前的亚洲高原，大约从公元前 1000 年起以迄公元后第 12 世纪，二千多年的历史只占原书 212 页。第二章的内容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即一般所谓蒙古帝国史，它占原书 303 页，约当全书的一大半，但所叙述的历史则只有三四百年，自 12 世纪中叶至 15 世纪末。第三章是写从 16 世纪初至 1759 年间的历史，只占原书 85 页。所以，蒙古帝国史在全书中占了重要的位置。这并不奇怪，因为威慑过欧亚二大陆的蒙古帝国在今日史学界仍被看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对象，它牵涉的范围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帝国为广。

西方史学界的蒙古帝国史学还在发展之中，它不似中国元史学那样狭隘，元史学只不过是蒙古帝国史学的一小部分。当然，蒙古帝国史又和蒙古民族史不同，而蒙古民族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蒙古民族是指在历史上所有“鞑靼”民族，它包括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诸部落民族；狭义的蒙古民族则只指围绕着戈壁大沙漠，从阿尔泰山到黑龙江流域间讲说蒙古语的民族。事实上，民族也不过是一种历史范畴，它并非永恒不变的，它的构成因素、血统、语言、信仰、生活方式等，是在不断地改变着。蒙古帝国内各汗国的上层构成分子不只是

真正的蒙古人，他们可统名之谓突厥—蒙古人，而且后期蒙古帝国的创立者帖木儿，已是个纯粹的突厥人。

《草原帝国》是世界通史性的，它不拘于一国，也不限于一个民族。一般通史要叙述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内容。在《草原帝国》内有较多的篇幅记载王朝的更迭，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封建领主们互相撕杀和循环报复等。在经济方面，作者重点地分析游牧人民的共同性，说他们与邻居农业国家的关系主要不是表现在和平时期的交易，而是在战争时期的掠夺。在论述文化方面，作者的见解是新颖的。他的草原艺术论将里海沿岸的斯基泰艺术与河套的鄂尔多斯艺术联接起来，以说明古代草原文化的同一性。他强调希腊文明在中亚细亚的影响，他证实景教、佛教与伊斯兰教先后在中亚细亚建立过教会区。他还特别提到蒙古帝国对开辟欧亚孔道和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这是一部研究蒙古帝国史学者们所必需的参考书。在内容上它比多桑与霍渥尔的书丰富和完备，它不似多桑的书仅局限于伊儿汗国和霍渥尔的书仅完成了蒙古帝国史的一部。格鲁塞利用了多桑与霍渥尔所没有见到的新发现的史料和现代东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草原帝国》并不是一部断代的蒙古帝国史，它是一部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通史。在它以前，已有过类似的著作，例如巴克尔的《鞑靼千年史》（伦敦，1895年版，向达等译，1937年版）和德格涅的《中国北方各族即自公元前至今日的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巴黎，1756年版），但和《草原帝国》比较一下则不只显得它们的陈旧，而且在内容的丰富方面也是相形见绌。

最后，我们还应特别指出一点，即这部书的内容有许多部分和我国少数民族史有关。在每一个朝代，少数民族都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少数民族又曾在西方建立过较大的帝国，与西方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和交通的不便等原因，只记载下来了这些少数民族在东方活动的一面，其在西方活动的一面还要凭借西方历史学家们的著述。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斟酌人名、地名的准确译音，但到最后还是感到不满意，真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草原帝国》一书，大约有二千五百多个人名、地名，其中有的是属于欧洲的，有的是属于亚洲西部、中亚细亚和印度的，有的是属于我国境内少数民族的。现在，大部分的译音已渐归于统一，还有少量的译音是随著者不同而有异。用欧洲文字翻译东方各国人名、地名时，不但会因字母不同而产生变异，即在同一文字中同一东方名字也有不同的拼音。所以，译音的不统一是不足为奇的。在古代地理名词中，常有因时代的不同而译为不同的名字的。何况，地名往往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变更。

过去，学者们对《元史》感到不满意，其名词的前后不一致实为大病之一。清代史学界致力于《元史》的改造者不乏其人，对该书中存在的人名和地名译音尤多方加以考证。然汉文译音若无其他文字拼音与之对照，则仍不能臻至善之境。1781年，乾隆帝敕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以满文字母将三史内非汉语名词的译音一一拼出，因而明朗化了不少专门名词的译音来源和原文意义。

当然，在各民族语言中，有习惯以某些特殊称谓作为人的命名，因而会出现一些人名相同的历史人物。清代史学家魏源(1794~1856年)在他的《元史新编》里作了一个蒙古人名的统计，说在“元史”里有124人叫作帖木儿，15个人叫作脱脱，10个叫作不花，9个人叫作伯颜。所以，在遇到两个以上同名的历史人物时就不免会发生混淆。在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帖木儿帝国的创始人帖木儿，这个名字极通用于突厥和蒙古人中间。为了把他和其他的帖木儿加以区别，本书著者格鲁塞采用了他的讹名达米尔兰(Tamerlan,来自Timour Lenk)。但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鉴于《明史》曾屡次提到他的原名“帖木儿”，我们也就遵循了这个传统的译法。

在旧元史学中，译名约有四种来源：魏源、洪钧、柯劭忞等多本自《亲征录》；屠寄则多本自《蒙古秘史》；宋濂等编纂的旧《元史》和修改了旧《元史》译音的清朝乾隆版殿本《元史》。四者译音有时区别很大，我们采用了其中比较通用而与蒙古语原音又甚相近者。

地名译音对历史学的重要性并不下于人名译音。所以洪钧在他的《元史译文证补·西域古地考》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二卷，屠寄在他的《蒙兀儿史记》里有“西北三藩地通释”一卷，施世杰还专门为《蒙古秘史》作了“山川地名考”十二卷，丁谦作了“地名考证”十五卷。清代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与近人冯承钧氏的《西域地名》是研究中亚细亚古代地名的很好参考书。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对外国地名尽量采用现在通行的译名，如克鲁伦河而非《元史》上的怯绿连河或胘胸河，鄂嫩河又非《秘史》上的斡难河。如果古今名称不同而原著者有意识地写作古代名称时，我们则以汉文古史中的译名代之，例如阿姆河是现代名称，而乌浒河则为古代名称。在中亚细亚还有许多古代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废墟，我们当采用古代历史上的译名。

在这里，我特别提出“乌浒河外地”的名称问题，原著者以“乌浒河外地”代替“索格底安那”，但有时也偶然提到这后一名称。这两个名称都很古老。前者出自古希腊地理书，译文为“乌浒河以外地方”。据希腊学者解释，该地包括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全部地区，即相当于西辽所建“河中府”辖地。波斯地理学者所称“索格底安那”则只限于阿姆河以北的泽拉夫善河流域。至于索格底安那是否即是中国古史上的康居、粟特、粟弋和贵霜等，其地理范围是否相同，则

东西方学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格鲁塞的采用 Transoxiane，而非 Sogdianc，似亦有意在避免地理名词上的误会。译者将该名称直译其意而不译其音，所以避免给读者以生殊之感耳。

由于《草原帝国》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蒙古帝国史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概括地介绍一下关于蒙古帝国的中外史料和史学家们的专门论著。

蒙古帝国开创时的原始史料在中国所传者为《蒙古秘史》与《皇元圣武亲征录》二种，在西方所传者为《金册》。其实，三书同出一源，即《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此书原本为回纥字蒙文，在成吉思汗生时已撰修十卷，后于 1240 年又续二卷。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始将它译成汉文，改名为《元朝秘史》。在这以前六七年间，元仁宗曾诏令察罕译《脱必赤颜》的一种修正本为《圣武开天记》，即《圣武亲征录》的前身。清代史学家钱大昕（1728～1804 年）自《永乐大典》中钞出汉字蒙音与汉语对照的《元朝秘史》，实为元史学上的一大发现，因直至该时，《秘史》藏于禁中不传于外。其后李文田（1834～1895 年）参考六七种典籍为该书作了笺注。《圣武亲征录》一卷亦为钱大昕自《四库提要》所钞出者，后经张穆（1805～1849 年）与何秋涛（1824～1862 年）二人详加校讎。

《元朝秘史》于 1866 年为俄国传教士帕雷底阿斯（1817～1879 年）译为俄文，书名改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传说》。该传教士又于 1877 年将《皇元圣武亲征录》译出，书名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此后，即未闻该书有其他欧洲文字的译本。直至 1941 年，苏联始出版了郭增的新译本，书名为《秘史，1940 年作的蒙古编年史》。1947 年，蒙古达木丁苏伦出版了蒙古文的《蒙古秘史》。1948 年，德国海涅士出版了德译本《蒙古秘史》。

《金册》是较《秘史》晚出的译本。《秘史》直接译自“脱必赤颜”的原始本。《金册》所根据的修本则凡稍涉皇帝忌讳者皆删除之。可惜，这部藏于秘室和由大臣守护的“金匱副本”早已失传了，现在我们只能就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哀丁的《史集》以窥测《金册》的内容之一斑。

拉施特哀丁于 1310～1311 年间写成《史集》，共分四编：第一编题名献给合赞汗的历史，除序文外包括突厥及蒙古诸族的历史、区分、谱系、家系、口碑等；第二编叙述成吉思汗，其先世及后代的历史，在中国止于铁木耳（成宗）朝，即 1294 年，在波斯止于合赞汗朝，即 1304 年；第三编记载古代西方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及伊斯兰教以前的波斯古代诸王史；第四编内容更为丰富，自穆罕默德创教至 1258 年蒙古人讨灭哈里发王朝，并涉及中国、印度、法兰克人、基督教与佛教历史。《史集》于 1836 年由法国嘉特迈尔译为法文，唯只出版了第一册，题名《拉施特以波斯文写成的波斯蒙古史》。该书内容有导言 84 页，序论 146 页，译文与原文合璧计 423 页，但仅包括旭烈兀汗一朝政事。俄国贝勒津于

1858、1861、1865、1888年陆续发表了俄文译本，即《编年史集蒙古史》（见《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报告》第5、7、13、15卷内）。但其所译亦只是该书的一小部分，即《突厥与蒙古部族考》与《成吉思汗本纪》二章。该译本1946年由苏联科学院再版。1952年又有斯米尔诺娃的俄文新译本出版（仅为《史集》第一册）。《史集》的其他部分的外文翻译有：哈木耳-普尔斯达耳的德文译“中国”一章，克拉普罗特的法文译“中国”一章，哀特曼的德文译《突厥·鞑靼及蒙古部族考》，1841年加安的法文译本《法兰克人史》。就拉施特哀丁的《史集》作总括的研究者，应首推法国布洛舍。他于1910年出版了《拉施特史集导论》（1910年荷兰莱顿版）。除拉施特哀丁的《史集》外，关于蒙古帝国的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史书尚有《世界征服者史》、《瓦萨夫书》、《史记全编》与“扎阑丁算端传”。

在汉文典籍中，除《蒙古秘史》与《皇元圣征录》外，关于蒙古帝国创立时的史料还有彭大雅与徐霆合著的《黑鞑事略》，孟拱的《蒙鞑备忘录》和陶宗仪的《辍耕录》。《元史》当然是一部更重要的著作，它是由宋濂、王祜等共同编修的。《元史》所根据的主要是于洪武二年（1369年）获得的《元十三朝实录》与《经世大典》，其顺帝一朝因无实录，遂由欧阳佑等在北平采访遗事以补充之。在编修过程中，二次开局，前后不过十四个月，仓促成书，舛驳罅漏在所不免，计本纪47卷，志53卷，表6卷，列传97卷。当时人如顾炎武、朱彝尊、徐夔等即对其加以非议，谓其事迹不详，体例不合，文字不校。然《元史》仍不失为一部史料丰富的大型著作，它可与波斯拉施特哀丁的《史集》相辉映。西方学者对《元史》的研究亦为时甚早。法国汉学家宋君荣（1689~1759年）于1739年出版《元史》的部分翻译：《成吉思汗及中国的蒙古诸王史》。俄国东方学者夏真特（1777~1853年）于1829年自《元史》译出《蒙古最初四汗史》。

将纪传体《元史》改编为其他类型史书者有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4卷）与邵远平的《元史类编》（42卷）。其后，汪辉祖著《元史本证》（50卷），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是纯粹对《元史》的考据学。清中叶后，魏源（1794~1856年）著《元史新编》（95卷），曾廉著《元书》（102卷），二者皆有倾向超出元朝一代史的范围，但史料仍局限于汉文典籍。清季，洪钧（1840~1893年）自西文译出有关蒙古帝国史文献若干篇，题名《元史译文证补》（虚目30卷，实存20卷），所以证汉文史料所未确者，与亦中国所未闻者。于是《元史》研究者始知其国外有大宗与蒙古帝国有关的史料。洪钧列举其所参考《西域书目》于卷首，其实他并未直接参考所列各书，其所译者大部出自俄、法、英、德文著作。按洪钧出使欧洲时在1887~1890年间，至俄国后即获得拉施特哀丁原著，但不能通晓，后多方购求多桑著作不可得，乃先自英人霍渥尔斯与德人华而甫的书试译之，继而发现多桑著作于德国皇家图书馆。洪钧还参考了德人哈木耳、普尔斯达耳的书与波

斯史学家术外尼著作西文译本。其所作“驸马帖木耳补传”则本自《东罗马书》，不知其所指为何书。在他编写《太祖(成吉思汗)本纪译证》时，参考了俄人贝勒津所译《史集》。洪钧死时《元史译文证补》尚未付印，后由沈曾植与陆润庠于1897年刊行之。

洪钧的书为元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步其后尘者则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160卷)。作者“以不啻有元一代”标榜，其批评魏源谓“身未出长城一步，其所勘订不外旧籍”，非难洪钧谓“所据皆百年前之西书，故其说地，东略而西详”。但作者自己却宣扬曾“从事关东五年，往来蒙兀草地数四”，说他因参加《大清会典》撰修工作而充任黑龙江舆图局主任，“故于蒙兀初起用兵及东道诸王公地，一山一水，皆能知其古地今名，分注纪俾中，大足补洪、魏二家之阙误”。所惜者，屠寄亦不谙外文，他所参考的西文著作是由他的两个儿子孝实与孝宦分别译出的。

元史学至柯劭忞(1850~1931年)的《新元史》(257卷)，可谓集其大成。其中有采自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氏族志》)与魏源者，有得之于何秋涛(《圣武亲征录校正》)与李文田(《元朝秘史注》)者，有录自洪钧与屠寄者。凡洪钧所译列传皆照录全文。柯氏编写《新元史》费时四十余年，于1922年出版，其中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外附目录一卷。作者参考过何种西文著作无从得知，但其将西域三宗藩的后裔胪列清疏则远胜洪、屠二氏书中的有目无篇。柯氏的书完全仿断代史的体例，以元朝一代为范围，非如屠氏企图撰修蒙古帝国史或蒙古民族史也。

当中国元史界洞悉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史料后，苦无完善的译本足供参考，不得已遂求诸欧洲文字的著作，其中以多桑与霍渥尔的书为最重要者。瑞典人多桑(1780~1855年)于1834年开始出版其所著《蒙古史，自成吉思汗迄帖木儿别或达米儿兰》，至1852年，该书全部出版，共分七卷：成吉思汗本纪；自窝阔台汗至蒙哥汗；自忽必烈至托欢帖木儿(元顺帝)；蒙古征服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自阿尔哈汗的统治至阿鲁浑的叛乱；自阿鲁浑的即位至哈赞汗的统治；完泽笃不赛因等汗的统治与帖木儿的出现。多桑书曾是西方研究蒙古帝国史的权威著作。该书的前三卷于1909年由中萃一郎译为日文。我国学者冯承钧氏于1934~1935年先后翻译出版其全部，这一译本对我国元史学与蒙古民族史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霍渥尔于1876~1888年间陆续出版《从第9世纪至19世纪的蒙古史》。其第一编为《蒙古本部部族与喀耳木克人》记载蒙古先世、种族源流、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与蒙哥等四汗兼并各部之事，以及忽必烈以后诸汗等；第二编为《在俄罗斯与中亚细亚的所谓鞑靼》；第三编为《在波斯的蒙古人》；第四编为

《补续与引得》。作者未曾完成的其他两个部分是察合台汗国史与帖木儿（达米儿兰）汗国史。就这部书的范围言之，它并不拘限于蒙古帝国，而是一部广泛的蒙古民族史；就其资料的丰富言之，它较多桑书所包涵的为多。所惜者，作者未能将察合台汗国史与后期蒙古帝国史完成。

多桑偏重蒙古帝国史，而霍渥尔斯则以蒙古民族史为内容，二者虽各有所取，但今日读者皆感觉二书甚为陈旧和缺漏。在现代法国史学界合作出版的《世界史》丛书内，有“草原帝国”著者格鲁塞作《前期蒙古帝国》（1941年版）与布注著《后期蒙古帝国》（1927年版。冯承钧氏中文译为《帖木儿帝国》，1935年版）。格鲁塞在其书内偏重史料，特别是《元朝秘史》的注释，末附对《圣武亲征录》内容的鉴定。书分五章：1. 成吉思汗前的蒙古；2. 蒙古王国的形成；3. 蒙古帝国的建立；4. 蒙古帝国的转变（终止于忽必烈对海都斗争的胜利，1301年）；5. 蒙古征服的总结（是著者对蒙古帝国的评价，亦是全书最精彩的所在）。这本书还附录有《世界史》丛书主编卡外纳克的蒙古各汗国简史：中国、察合台汗国与印度、波斯汗国、俄罗斯汗国、欧洲等，所以补格鲁塞未曾叙述的部分。布注著“后期蒙古帝国”亦着重于史料的介绍，惟不似格鲁塞的过分强调考据学。该书内容包括：帖木儿本纪（1336~1405年）、帖木儿后裔（1405~1502年）、巴拜儿与印度的蒙古王朝（1526~1857年）、花刺子模诸王子（基发国汗王）等四部分。《世界史》丛书内这二部《蒙古帝国》在考证方面胜过《草原帝国》一书，但在“前期”与“后期”间失去衔接，非如后一书的能贯串“前”“后”为一整体。在蒙古帝国史实的叙述上，《草原帝国》则较此二书为详，而其内容范围又不只包括蒙古帝国。

以上所述乃近百年来西人研究蒙古帝国史学的主要论著，但彼等在此方面的成就尚有史料的汇集与专题探讨之二途。在史料汇集方面，就常引征者言之则有下列数种。白莱脱胥乃德于1887年后陆续出版了《中世纪东西史料研究对自第13世纪至17世纪时中亚与西亚的地理与历史的认识》。该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为元代西游诸家的记载，即耶律楚材的《西游录》（1219年）；乌古孙的《北使记》（1200年）；长春真人的《西游记》（1221~1224年）；刘郁常德的《西使记》（1259年），与耶律希亮的《避难西域记》（1260~1263年）。第二编为元代亚洲西部诸民族及中国史书纪元初西征事迹考证。第三编为《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及《元史》地理志西北地考证。第四编为明初中国与中亚的交涉、《明史》西域传及《大明一统志》的西域传考证。《亚美尼亚文史料中的蒙古史》，分二册，于1873~1874年由巴特柯诺夫汇集和翻译。其第一册包括瓦尔丹、奥比里安与三帕德的著作选文；第二册包括杞刺司可·干札克的历史著作。《关于金帐汗国历史的文献集》是由铁森加乌增编译的。作者原计划出版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史料二种，在生前只完成

了前一种。其第一册于1884年出版，第二册于他死后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整理，在1941年才行问世。

十字军战役与蒙古帝国几乎是同时代的。十字军史的作家们对蒙古帝国的历史记载颇详，所以十字军史料亦为研究蒙古帝国史时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十字军史历史家作品集》为法国铭文学院于1841~1906年间分十六巨册陆续出版的。书分五编：1. 西方历史家（5册）；2. 法兰克人法典（2册）；3. 东方历史家（5册）；4. 希腊历史家（2册）；5. 亚美尼亚文献（2册）。

德国蒙古学家史密德于1829年在彼得堡出版蒙文《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本，书名为《东蒙古人与他们的王室的历史》。《蒙古源流》8卷，原为内蒙古鄂尔多斯人萨囊彻辰台吉于1662年时所著，1777年乾隆帝敕译为汉文。该书以佛教为纲，叙述15~16世纪蒙古诸汗的起源，蒙古诸汗与其他各汗、各封建主的关系，以及封建制度等。1955年，德国学者海涅士根据在库伦新发现的手抄本将萨囊彻辰书译为德文（柏林版）。次年，在美国的剑桥由田金波翻译出版英文本，书名为《宝贝史，蒙古编年》。在17世纪，与《蒙古源流》同时流传的还有《黄金史》，其内容与前一书大致相同。在1858年时，该书被冈波也夫译为俄文，书名为《黄金史，蒙古编年》。这部史书在近几年内有两个英文译本出版：一是在美国的剑桥由田金波于1952年翻译出版的《黄金史，蒙古族简史》；一是在1955年德国维斯巴登出版的由鲍登翻译的《黄金史，蒙古编年》。

当在中国内蒙古受佛教影响的《蒙古源流》问世时，在中亚细亚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突厥世系传记》，由基发汗国王、蒙古遗族阿不合乞八哈都儿（1605~1665年）于1663~1665年间完成。这部书共分九卷：1. 自亚当创世至蒙古汗；2. 自蒙古汗至成吉思汗；3. 成吉思汗；4. 窝阔台及其后裔；5. 察合台及其后裔；6. 拖雷及其后裔；7. 术赤及其后裔；8. 在乌浒河外地、克里米亚、哈萨克与都兰的昔班汗的后裔；9. 在花刺子模的昔班汗的后裔。1854年，俄国学者萨布洛柯夫将其译为俄文，书名易为《突厥族源流》。其后，1871~1874年，该书由法国学者戴美桑分二册译为法文在彼得堡出版，书名为《蒙古与鞑靼民族史》。

关于蒙古帝国史中某一些方面的专题研究，有下列几种最重要的著作：哈默尔·博格斯的《钦察金帐汗国史》（1840年，布达佩斯）；格勒柯夫与雅序博夫斯基的《金帐汗国及其灭亡》（1950年，列宁格勒—莫斯科）；斯普列尔的《在伊朗的蒙古人》（1939年，莱比锡）、《蒙古时代》（1953年，莱顿）；巴托尔德的《蒙古侵略下的突厥斯坦》（1898~1900年，彼得堡）；符拉基米佐夫的《蒙古社会组织，蒙古游牧封建制度》（1928~1934年，莫斯科）。

以上所谈可能是些多余的话，只不过介绍了一部分较为生疏的外文著作，并向我国读者谈到了著者简历、书内大意，以及翻译上的问题。至于后一部分史料

和史书的列举，即希望补充原书应具备而缺漏的参考书目，也希望明确在这方面过去研究的情况并烘托出本书的学术价值。译者在巴黎时曾亲聆格鲁塞教授的《远东史》讲课，初未料及能在十数年后有将其著作之一译成汉文之举。惟译者知识有限，推敲乏术，离“信、达、雅”之道甚远。尚望海内史学界与翻译专家不吝赐教，以便日后有所遵循。

本书能顺利出版，是和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热情的帮助，辛勤的劳动分不开的。地图的绘制得到青海省文化厅文物处的资助和考古研究所的支持，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魏英邦

一九八七年六月

“耶和华说：……我必兴起迦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新旧约全书·哈巴谷书》第一章，第7~10节）

著者原序

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所有的回忆录里。西方纪年学者们的、中国或波斯的编年史家们的记载里把他们的形象大众化了。他们，伟大的野蛮人，出现于完全文明化了的时代，而在几年之间突然地把罗马世界、伊朗世界或中国世界变成为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失踪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以至于实际的历史，将这些人看作是上帝降下来的灾难，对古老的各种文明的一种惩罚。

但是，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的。草原制造了这种体格矮小和粗短的人，他们是不可驯服的，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那样的自然条件下。高原上的烈风、严寒酷暑把他们的面孔塑成为有细长眼的、颧骨突出的、汗毛稀少的，把他们多节的身体坚硬化了。随意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的游牧制度，游牧经济的条件使他们和定居人民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有时是懦弱性的借贷，有时则是屠杀性的掠夺。

如果将出人意料地切断了我们历史的那三四个亚洲的大游牧者当作是一种例外的事情，则仅仅是由于我们的无知。他们之中有三个人实现了这种惊人的鸿图，成为世界的征服者；但还有多少阿提拉与成吉思汗并没有成功，我说他们只成功地建立了限于亚洲四分之一的帝国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到波斯，这还是可以确认为大规模的冒险行为。我要在这里引述和说明在本书封面标题上题写的三大人物，是他们统治下的这个大野蛮民族，在十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中奔驰

于中国边界与我们的西方边界之间。

但重要的是明确指出问题。古典世界在它的领土上有过各种不同的野蛮人，这里我要说的是被邻民族认为是那样的人民。凯尔特人曾经长时期地被罗马人看作是野蛮人，日耳曼人的被高卢人，斯拉夫世界的被日耳曼世界看作是同样的。中国南部也曾长期地被黄河流域的原始中国居民看作是野蛮人的国度。但在这些不同情况下的地区由于它的地理条件同样地保留给农业生活，在那里居住的人民，尽管是落后的，也将逐渐地取得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在中世纪中叶的时候，我们欧洲的几乎全部、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都早已经达到了同一阶段的物质文明。

不过，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带曾经摆脱了这种运动。这就是那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领土，草原地带。它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是在它的北方边缘延伸着。在那里，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块土地以外，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业生活的发展，把居民们限制于永远过着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时的生活还存在于其他的人类中间。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带的部落，还停留于马德林式猎人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遂成为野蛮人生活的保留地，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是理解的）在那里居住的人民在人的品质上比其他民族下贱，但只是因为那些人民曾经长期地停留于其他地区早已超越了的生存条件下。

当亚洲的其余部分早已经达到了极其先进的农业阶段时，这部分停滞于畜牧阶段的人类的继续存在对历史的剧变有过很重要的影响。是他们引起了邻居人民之间编年学上的差距。公元前 2 年时的人和公元后 12 世纪时的人并存在一起。只要从蒙古高原下行到北京，从吉尔吉斯草原往上走到伊斯法罕，就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的人类。二者之间的切断是粗暴的，引起的灾祸是严重的。对中国、伊朗、欧洲的定居人民说来，匈奴、突厥、蒙古人是真正的野蛮人，应当用一些炫耀去恫吓，用一些玻璃珠子或封号去哄骗，让他们远离那耕种的土地。至于游牧人，他们的心情是可以推测的。在天旱的年代里，那些贫苦的突厥—蒙古游牧者在少草的草原上向外流亡，从一个涸水点到另一个涸水点，一直到达农田的边缘——北直隶或乌浒河外地的门户，在那里他们惊愕地观赏定居人民的文明奇迹，丰富的收获，乡村充满着谷物，都市显得豪华。这种奇迹，或者确切一点说，这种奇迹的秘密，即在建立这些人类蜂窝时所费的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为匈奴人所了解的。假使他们眼花了，他们就像一只狼——匈奴人的兽祖（“图腾”），从雪地里走近了农庄，因为他们瞧见了篱墙后面的猎物。千年来他们的反射作用是突然的侵入、掠夺，带走了战利品的逃亡。

一种畜牧和狩猎人类的继续存在于一种农业人类的旁边，或者宁可说，日趋

富裕的农业社会的发展看到和接触到停留在畜牧生活和由于天旱而草原生活受到了可怕的饥荒危机的人民时，则将是在极显著的经济对比上加上了时常是极其残酷的社会对比。我们重复一下说，是这种人文地理上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定居人民与游牧人民之间相互的情感是等于在一个近代城市中包含着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个无产阶级之间的情感。农业社会，不论它是在耕种华北肥沃的黄土地带，或是伊朗的果菜园地，或是基辅的丰饶的黑土地带，是被一片贫瘠的牧场区域所包围，这地区的气候条件时常是很可怕的，在那里十年之中总有一年水要干涸，草要萎黄，牲畜要死亡，人也随之饿毙。

在这样的条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地向农业区域侵犯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加之，这些突厥人或蒙古人是属于一个智慧的、沉着的、好实践的种族，他们被环境的艰苦现实所锻炼，自然便养成了统率众人的才能。因为定居人民的社会时常是颓废的，在冲击之下就会崩溃；游牧人进入城市之后，在最初的一个时候是屠杀，接着便毫不费力地把他们打败的统治者取而代之。他们大胆地登上了极其尊贵的皇位，成为中国的可汗，波斯的王子，印度的皇帝，罗姆的算端。他们会适应环境，在北京他们成为半个汉人，在伊斯法罕或雷依成为半个波斯人。

如果是这样，那么草原与农业区域之间有保证的和解是命运注定的吗？完全不是。人文地理上的严酷的法则在继续起着它的作用。假使汉化了或波斯化了了的汗王们没有当地居民们的反击，就被逐渐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话，却有新的部落出现于他们的边境；那些出现于草原深处而还正在忍受着饥饿的部落把他们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个暴发的塔吉克人或一个拓跋人，一个波斯人或一个汉人，他们重新开始不利于他的同样的冒险行动。

这种冒险行动几乎常常是成功的，同一个调子在一千三百年间——因为从匈奴人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恰为一千三百年，重弹了几次。这是因为什么？在整个时代里，虽然在物质文明方面游牧人是很落后的，但他们在军事上保持着一种先进的、极大的优势。他们是骑射手。他们用优良的射手组成了一种非常灵活的骑兵队。这种专门“武器”使他们在定居人民面前保持着一种优越性，犹如在近代欧洲有炮兵部队来保证它对其余世界的优越性。毫无疑问，汉人或伊朗人并不是没尝到这种武器的。在耶稣纪元前3世纪时，汉人就改变了他们的服装，以适应于骑兵。至于在伊朗，从帕提亚人时起就知道由一群逃奔着的骑士射出的飞矢的滋味。但不论是汉人、伊朗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不能够在这方面和蒙古人相比。蒙古人从小就会追逐奔驰于无际的草原上的野鹿，习惯于看不见的和长期的埋伏，及猎户的各种诡计；是在这种场合他们获得食物，即生活在这种场合他们是所向无敌的。但他们并不是时常与敌人对立，相反的，他们在出人意料之外时攻击敌人，然后即刻逃走；重新出现，便猛烈追敌，但不让敌